

列強對中國抗戰的態度 （一九三七—一九三九）

鮑 家 麟

日本挑選侵華的時機都是在列強無暇兼顧遠東的情形下。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正值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美國和列強都為國內的問題焦頭爛額，無暇以實際行動保護遠東的利益，日本遂順利侵占東北。蘆溝橋事變爆發時，國際間瀰漫着獨裁與民主對立的緊張氣氛，德國和意大利的發展頗令西方國家憂慮。墨索里尼剛征服衣索比亞；希特勒破壞了凡爾賽和約，重新建軍；德意聯合干涉西班牙的內戰，使歐洲和平飽受威脅。西方各國的注意力集中於歐洲，相形之下，遠東較為平靜無事，列強更不願意相信日本有蠢動跡象。

國際間維持和平的制度力量正日益薄弱。九一八事變時，世人對國際聯盟寄以厚望，相信侵略者會受到制裁，但隨着事態的發展，越來越感覺灰心。此一情勢間接鼓勵野心國家的侵略舉動。雖然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等人曾經作過道義上的努力，而侵略者依然逍遙法外。日本的作為似在公開嘲笑華盛頓會議的決定，而意大利製造的衣索比亞危機更澆滅了人們對國際聯盟維持世界和平能力的一線希望。

一九三〇年代，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逐漸抬頭。蘆溝橋事變前，孤立主義者的力量正大。面臨此一情勢，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惟有設法遏阻歐洲武裝衝突的趨勢，恢復使用戰後由國際合作以尋求世界永久和平的方法，同時避免引起孤立主義者反對的聲浪。羅斯福費盡心機，謀求種種辦法，治標的如建議國際合作來採取聯合行動以對付破壞和平的侵略者；治本的如建議針對戰爭潛在原因的經濟不景氣圖謀補救。但無可否認的，在民國廿六年夏天，羅斯福的注意力正集中在歐洲。

美國國務院對遠東局勢抱着樂觀的看法。國務院的遠東司相信，如果中國不斷蓄精養銳，中日戰爭當可避免，因為日本不會貿然攻擊一個顯然有防衛力量的鄰國，而中國在經濟穩定與政治團結方面都有了了不起的進步。¹ 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與漢彌頓（Maxwell Hamilton）在華府的午餐會上向孔祥熙表示這種看法，霍恩貝克希望中國繼續重建工作，「勿與外國爭執。」孔祥熙相信中國對日難免一戰，中國雖然在備戰，日本也在備戰，且一年比一年更強大。霍恩貝克認為不然，因為中國是沿建設的途徑發展，而日本正多方面消耗其元氣，足以削弱其力量。

¹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以後引作 FR), 1937, III, 132.

英美對蘆溝橋事變的態度

蘆溝橋事變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爆發時，美國政府並不擔憂事變會擴大。次日，美國大使館遣往出事地點觀察的人員報告說，雖然還有槍戰，但鄉間平靜無事，農人仍舊從事耕作。²美國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將此報告寄往國務院，附帶說明北平很平靜，並無兩方軍隊調動的跡象。美駐日大使葛魯（Joseph Grew）也電告華府，認為事件解決有望，日本外務省聲明中國軍隊放槍「並非預謀」。葛魯七月十日給霍恩貝克的信上也說，他並不擔心蘆溝橋事變的後果，也不相信有遠東國家正在「預謀發動戰爭」，即或有衝突事件，也不會引起大麻煩。³

美國政府先後得悉日方向華北政府提出要求和雙方調動軍隊的消息，這時才覺察事態嚴重。中國外交部長在七月十二日邀請詹森和英駐華大使許閣森（Sir Hughe-Knatchbull Hugessen）至南京，詹森未去，理由是如果情勢惡化，他在華北或可效勞。七月末，他才正式應蔣委員長之邀請赴京，在美國方面看來，詹森因離開華北而未能再為華北的和平效力。蔣委員長向許閣森表示：「現在局勢，只有英美兩國努力從中設法，或可變為和緩，而東亞和平亦可維持。此意請即轉達貴國政府。」⁴

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對七七事變的反應是這樣的：七月十二日，日本大使走訪赫爾，並出示一備忘錄，說明日本在事變中的立場，強調日本加派軍隊僅為防範措施，事實上仍希望經由談判和平解決。赫爾顯然相信日本大使的話。⁵次日，他邀請日本大使會面，根據赫爾本人的記載，他曾向日本大使說：

對我國和政府，和平狀況極為重要，自然我們十分關切和平狀況的任一面；不論我們對遠東危機說什麼或作什麼，動機對有關各國都是最不偏袒而友好的；在北平混亂情形下，我們沒法看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即使我們現在為了幫忙而說話，絕無調解的問題牽涉在內。⁶

赫爾居然說出無意調停的話來，霍恩貝克曾勸告赫爾慎勿同意調停，因為美國採取行動殊為不智，當時美國政府至多只能向中日表示「很不喜歡」遠東衝突的爆發（look

² *Papers Relat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以後引作 *FR Japan*）I, 313.

³ *Grew Papers, 1937* 七月十日信。引自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77.

⁴ *FR, 1937*, III, 154, 162. 蔣委員長語見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中譯本第十一冊，中央日報社，民國六十六年，頁六八。

⁵ *FR, Japan, 1931-1941*, I, 318, 316.

⁶ 同上，320。

with great disfavor)。英國提議商量英美合作仲裁可能性的時候，赫爾也婉拒，這都是受了霍恩貝克判斷的影響。⁷

英國的調停建議是以備忘錄的方式於七月十三日提出的。七月十二日，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也曾要求英國調停。英國政府惟恐日本乘機鞏固在華北的地位，於是外相艾登（Anthony Eden）要求赫爾與英法政府聯合要求東京節制行動，並提醒日本在華軍隊已足夠應付解決蘆溝橋事變的情況。華府重視英國的建議，赫爾與國務院中的霍恩貝克及戴維斯（Norman Davis）等商議後，立即草擬覆文，經總統批准後，指令霍恩貝克在當天遞交英國大使。⁸

答覆中說，國務卿在事變後已會見中日使節，並告以「維持和平的重要性」，事實上，美國已朝艾登建議的方向去努力，但全文未提及仲裁的可能性。美國政府由衷同意由英國來從事艾登的計劃，英國政府的這種作法與美國的政策並行不悖。英國大使仔細地閱讀了美國的覆文說：「我想，這意思是說美國政府無意派代表參與東京與南京的事務。」⁹霍恩貝克解釋說美國政府想和英國合作，但覺得「獨立從事並行的合作（cooperation on parallel but independent lines）」會更有效，而且較不會產生一致合作的反效果。總之，美國不想被捲入調停糾紛的工作。

美駐日大使葛魯的看法亦同。七月十四日葛魯電告國務院：日本政府認為蘆溝橋事變是中日兩國的事，因此將拒絕仲裁。葛魯也勸告美國務卿慎勿提出調停的要求。日本不歡迎西方列強參與遠東事務，而日本外交政策主要目標之一便是排除西方在東亞的影響，因此葛魯認為日本絕不會接受西方國家的調停。他更說：

我們希望指出美日關係的改善，使現在的關係比前此改善得多，這是因為美國政府在涉及中日關係事務的行動上轉移了重心。從前是（一）努力節制日本使用武力；現在是（二）強調美國在華權益必須保全。我們認為如果有組織的敵對爆發，我們應仍循過去四年的路線，僅在抗議不使情勢更緊張時，或在美國公民及其財產受威脅時，或人道主義的考慮迫使美國官方表示意見時，才提出這種抗議。¹⁰

詹森也同意葛魯的見解。美國的冷淡反應與英國熱心調解的態度恰成對比，而且與九一八事變時相反，那時美國熱衷調解而英國表示冷淡。日本政府充分瞭解這種情況，他們曾單刀直入地問英駐東京代辦杜茲（James Dodds）：「英國政府請其他政府作了什麼？他們的答覆是什麼？」杜茲據實回答，並告以華盛頓認為「這樣作不恰當。」

⁷ Borg, P. 287.

⁸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4 and 27; *FR*, 158, 159, 160.

⁹ 同上，160。

¹⁰ 同上，164。

九國公約似已成具文。赫爾無意引用九國公約來對抗侵略，深恐對事件的和平解決有害而無益。¹¹ 他僅在七月十六日發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談話，說到：

本國一向倡導維持和平。謹呼籲各國自制；謹呼籲各國勿以武力貫徹政策，勿干涉他國內政，謹呼籲以和平談判及協議之程序以調整國際關係上的問題。謹呼籲各國忠實遵守國際協定。¹²

並將宣言全文分送世界各國，請各國回覆以表明態度。赫爾在回憶錄中說：「六十國立即回信願遵守以上的原則，可笑的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都在內。」只有葡萄牙對赫爾的宣言採批評的態度。¹³

中國外交部建議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撤退軍隊，恢復事變前的情況，許閣森於十六日將此項建議遞交杜茲，著其立即轉致日本外務部。¹⁴ 杜茲將此事透露給美駐日大使葛魯，葛魯事後回憶說，「許閣森極重要的通訊；在歷史上不應被忽略，如果日人有意避免敵對行動的擴展，這就是最明顯的好機會。」¹⁵ 日方毫無誠意，答覆說蘆溝橋事變為一地方性事件，應由華北地方政府來交涉。

當中日關係更接近崩潰邊緣時，英國政府再次與美國務院聯絡，提出英美協助作地方性解決的計劃，要求中日雙方停止調動軍隊，並希望提出解開死結的辦法。赫爾在答覆英方建議前，先分別會見日本及中國使節，再度表示美國「友好而不偏倚」的立場，並重申前此一再表明的意見，希望中日和平解決爭端，美國願為「除調解以外」的辦法上效勞。在赫爾給英方的答覆中，他宣稱華府認為美國和英國政府在此以前依平行路線所從事的政策其實就是合作，仍應各自向中日政府闡明維持和平的重要性。¹⁶

七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牯嶺發表演說，表明抵抗侵略的決心。中日交涉無進展，雙方劍拔弩張，許閣森再度居間調解，七月二十一日他致電杜茲說：

我想我應當強調情況已非常嚴重。

很明顯的，蔣仍然希望和平解決，但是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會導致他的失勢……中央政府的立場是願意經由外交途徑，從各種角度，與日本談判目前糾紛，同時提出仲裁及其他解決方法，但是他們不會盲目接受從此破壞中央政府在華北地位

¹¹ FR, 1937, III, 189. 九國公約簽訂於一九二一年，九國係中、英、美、法、意、日、比、荷及葡。協定（一）尊重中國之主權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給予中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維持各國在華商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伺機營謀特殊權益。

¹² FR, 1937, I, 699.

¹³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2vols), I, 536.

¹⁴ FR, 1937, I, 187

¹⁵ Joseph C. Grew, *Turbulent Er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2vols.) II, 1050; *Ten Years in Jap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4, P. 230.

¹⁶ FR, 1937, III, 238, 235,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pp. 28-29

的地方性決定。

如果日本政府想像中國的態度有虛張聲勢的成分，那麼他們正鑄大錯。如果日本政府堅持與華北地方政府來謀求解決，完全排除中央政府，那麼他們必須瞭解戰爭不可避免。¹⁷

在英美外交人員看來，次日情況似有轉機，日外相告葛魯謂華北情況已有改善，不久可以圓滿解決。宋哲元將軍已在七月十九日與日本簽訂協議。¹⁸

七月廿五日詹森報告國務院說蔣委員長認為危機依然存在，不久日方會提出另一套南京政府無法接受的條件，那時中國只有抵抗。惟一避免中日發生戰爭的辦法就是「英美沿以往的路線，採取更有力的合作行動。」¹⁹

蔣委員長的呼籲在美國官員間引起注意。霍恩貝克在備忘錄中說明遠東危機中牽涉兩大問題：對中國來說，問題是日本是否會佔據華北；對西方列強尤其是英美來說，問題是是否要反對以武力貫徹國策，如果要反對，應以何種方式。²⁰ 英美既除道德說服外，無意使用其他方式擺平爭端，他認為蔣委員長的建議無補事態的發展。

美國的態度助長日本的侵略

美國駐日大使葛魯勸國務卿切勿採取與英國合作的「更有力行動」。他認為外國使節的努力不會造成有利的後果。他同意英國代辦的看法，知道日人有一步步逐漸控制華北的既定政策，但何時去抵抗日本仍要由中國決定。葛魯在日記中甚至說，保僑以外的任何外交活動都會被日人視為干涉內政，反使事態更嚴重。他特別強調他的同僚與他所見略同。他對英國熱心的態度極度不滿，早在七月十四日就得意地寫道：

幽默家會對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大轉變幽上一默。當初是我們出頭，站在前面，英國人不肯跟隨……現在我們的政府正在以高超的智慧玩牌或收牌。

葛魯堅持不參與的政策。次月，他很仔細地道出了他的看法：

在我和這裡所有的人看來，日本政府由衷感激事變以後我國政府的態度與行動。其間我們充分表明避免傷害美僑的重要性……及其他權利，此外，我們試圖幫忙……我們在此地所採取的每一步驟都不叫嚷，靜悄悄，有禮貌地，儘可能不發佈新聞。……一般人預料美國至少在事變發生時，可能會發佈一連串史汀生式的叫囂，……當日本政府瞭解現在華盛頓的政府無意遵循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

¹⁷ FR, 1937, III, 231.

¹⁸ 詳見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頁一七九至二一三。

¹⁹ FR, 1937, III, 256-257; Russell D. Buhite, 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29.

²⁰ FR, 1937, III, 278.

無效行動路線，他們自己的態度就越來越友善；而今天一有機會就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無論何時，當廣田寫信給我時，總不忘寫上幾句感激美國事變以後對日本友好態度的話。

他批評英國熱衷調解的態度。他說英國盡力抵制日本擴展在華影響力倒並未令他吃驚，令他吃驚的是英國人達成此一目標的「天真」，「愚蠢」，和不恰當的方式，結果造成雙方惱怒、猜疑、和怨恨的態度，這會使英日關係長久蒙上陰影。²¹

美國這種對中國漠不關心的態度確實助長侵略，就在蔣委員長對詹森談話不久，平津失守而淪入日寇掌握。這時，美國所關心的也只是美僑的生命與財產不受損害。

事態擴大以後，英國政府三度向華府建議採取遏阻此種發展的英美聯合行動。自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三日，英國提出了多種建議，最後一個建議就是由英美(一)提供一中立所在，使中日代表直接交涉；(二)協助解決任何談判中引起的困難。如果中日同意以談判方式解決歧異，英美應即要求日本勿再派軍隊入河北，要求中國政府勿再派兵北上。英國並說明此一建議乃服務性，而絕非干涉。²²

美國國務院不為所動，仍堅持以前的政策，赫爾與葛魯均如此。但美國並未拒絕英國的建議，國務院覆信英外交部說，任何可能維持和平的辦法都不應忽略，但他們要英國給他們時間先與葛魯商議。葛魯認為此一提議的成敗端賴向日本提出的方法與形式。他勸國務院勿以外交文書方式提出，而授權他與廣田作「口頭、秘密、半正式及解釋性的談話」，以免引起新聞界的注意。葛魯建議英國代辦亦分別與廣田作類似的接觸。這樣也許毫無效驗，僅為避免戰爭盡力而已。英美雙方政府都接受了葛魯的建議。²³

八月十日，葛魯走訪廣田，提出上述建議。廣田告以中日談判已在進行，日駐華大使川越茂已向外交部高宗武提出中日關係調整計劃，雖未透露計劃詳細內容，但聲明除非蔣委員長立即作肯定答覆，否則難免一戰，如果美國想協助，最有效的行動便是說服蔣委員長提出某種建議作為談判的基點。

次日，英國代辦杜茲見廣田，以一簡短的照會表示英國願意效勞調停，廣田仔細讀完照會後說，也許以後會借重英國的協助，其餘與葛魯談話內容相似。

葛魯與廣田談話報告的副本也寄給詹森，詹森於接到後，立即去電國務院，請求在頒發訓令時，應考慮他可能遭遇的困難，尤其是要求中國政府接受包括取締一切反日活動的計劃，以前日本的要求總有這一項。²⁴數日後，詹森又遞送一份補充說明給國務

²¹ 同上，291, 345, 529.

²² 同上，286, 289, 319, 328, 339.

²³ 同上，340;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pp. 32-33. 英國並曾於七月二十四日試探與德國合作，但無結果。同時，蘇聯暗示願與英國合作，英國對此則無反應。

²⁴ *FR, Japan, 1931-1941, I, 374.*

院，自從蘆溝橋事變後，這是他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提出具體看法的一次。

中日之間的爭鬭牽涉心理、政治、及經濟等各個模糊的範圍，雖然不可能對衝突原因及結果作精確估計，我由於職責所在，將不得不提出我的意見：日本軍人派系正迫使日本走上蠶食控制中國的路……我認為無法不使中國作一抉擇，因為中國遲早必須決定要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還是淪為屬國……

如果中日間發生嚴重敵對行動，對中國會造成莫大的損害，對日本也可能有害，但是會校正中國依賴外援的傾向，也校正日本認為帝國主義擴張會獲得有利後果的信念。

總之，我相信此時的妥協僅能拖延不可避免的抉擇，……由美國來督促這種妥協可能會嚴重損傷我們反對戰爭及反對違反國際協定的公開立場。由此結論可知任一方代表，如果不是為人道及國際道德發言，必須謹慎，對基本問題不作允諾，嚴格限於保障美國的利益。²⁵

八月十三日，國務卿的覆信說詹森的分析與意見頗有助益，大致與國務院中一般人的想法符合。就在覆信的當天，新發展使中國對日本建議的反應顯得不重要。日寇侵犯上海的八一三事變發生，而且延續了三個月之久，高宗武在南京未再離開，與川越茂的談判就此無疾而終。

列強對八一三淞滬戰爭的反應

七七事變的爆發使上海地區國人與日人間的緊張情勢更形惡化。七月底便有衝突事件發生，平津淪陷後，國人紛紛遷入租界居住。八月九日的虹橋事件與日人加派壹仟名士兵和大量武器彈藥之舉，迫使政府調派兩萬餘名士兵進入上海，自八月十三日開始，戰事延長三個月之久。

上海是西方各國在華利益的中心點，列強最為關注的是租界的洋人之生命安全與經濟利益。在虹橋事件之前，高斯（Clarence Gauss）曾要求美國國務院提出上海中立化的計劃，國務院未加採納。自八月八日至十二日的四日內，上海的外國領事團及南京的德、意、英、法、美五國大使，希望中日雙方保證不以上海區域為戰場，亦即上海中立化。美國國務院竟一度考慮要求中國片面撤軍，駐華的各國使節認為此一要求不合情理，尤其是日本已加派海軍登陸。²⁶

國民政府於八月十四日發表聲明，對友邦主持正義寄以厚望：

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

²⁵ 同上，385。

²⁶ FR, 1937, III, 369, 375, 376, 380。

所破壞無餘。……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爲中國，實爲世界而奮鬥；非僅爲領土與主權，實爲公法與正義而奮鬥。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

八一三事變後，各國代表聯合提議停戰退兵辦法，要求中日政府嚴肅考慮。蔣委員長要求列強「保證」日本政府履行協議，當然列強無法承諾。日人則強調軍隊乃保衛上海兩萬名日僑所需，此一建議遂無結果。²⁷ 八月十六日，五國大使擬議請日本以撤軍來保僑，日本軍隊駐在上海反而威脅日僑的生命安全。各國駐上海領事對情勢失望而反對，因而並未正式提出。

英國決定獨立再作一次調停的嚐試。這一次，英國的態度也比美國積極得多。十八日，杜茲向日本政府提出一套類似五國大使擬議的計劃，並說如果兩方撤兵，英國願與其他中立國家負責保護租界的日本僑民。各國對此案的反應是：法國同意，美國拒絕，日本反對，同時美國說明不願再介入中國國內之警察性任務。²⁸ 日本在正式拒絕時曾向杜茲表示，中國軍隊必須回到民國廿一年停戰時所定界線，那時日本政府才可能重新考慮此一建議。英國感覺和平希望大增，又復請求美國合作，國務院深感不耐煩，認爲英國政府不應該再三提出早已遭日本政府揚棄的計劃。英國恢復上海和平的計劃整個失敗。表面上，英國官方仍強調英美在此次危機中的團結和合作，官方談話刊於八月二十五日泰晤士報，但該報同日的社論又批評英美間缺乏合作，外務部批評這是「不負責任的新聞報導」之一例。²⁹

這時英美絕無意對日本實施制裁行動。七月三十日，美駐英大使曾在倫敦建議對日禁運，艾登也贊成，但兩人都非代表各人的政府發言。九月，抵達東京的英國新任駐日大使克萊奇（Sir Robert Craigie），較接近葛魯及美國政府的看法。克萊奇相信日本少壯軍人雖把持政權，決心侵略中國，但在日本國內因苛捐雜稅而不得人心。英國的溫和政策會促使文人政治家重新掌握政權，對中國實施較溫和的政策。他認爲西方強硬的行動只能刺激日本輿論支持軍人，因此，西方國家不應明白表示對中國的同情。³⁰ 這種論調在克萊奇及葛魯的報告中一再重覆出現。美國有人攻擊葛魯「親日」，並非言過其實，他對美國政府態度的影響也不能低估。結果，任何有力推動和平的計劃都不能實施。其間雖多次發表高調式的談話或演說，其目的是在顯示美國仍舊相信崇高的理想。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珍珠港事變，真是中國的大不幸。

²⁷ 同上，394，397，414。

²⁸ 同上，440-441，448-450；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pp. 38-39.

²⁹ *FR*, Japan, 1931-1941, 354, 355. Nicholas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 23.

³⁰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p. 48.

蔣委員長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致函美國總統及財政部長莫根索（Henry Morgenthau），大意是說：

我確實非常失望，美國竟不與英國合作來設法挽救目前的危機，如果英美聯合向中日交涉，情勢是可以轉變的。中國和全世界會永遠記得九一八事變後西蒙（Sir John Simon）未能與美國合作，而現在英國將永遠記得美國不合作。美國不應失去在這世界上國際正義主持者的聲望，如果美國繼續推行史汀生政策，可免使目前的衝突延伸至其他各國，包括美國在內。我不想把美國拖入戰爭，但我確實希望他來維持他在太平洋的地位與和平。現在開始行動還不算太遲，而我相信美國會設法為永久和平作一公平的解決。³¹

這封信是寄給財政部長而非國務卿。國務院顯然對蔣委員長的作法感覺不悅。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南京的感受夾雜著同情和情緒上的不快。他說，枯坐在南京，眼看日本人向亞洲大陸進軍，却無能為力，而中國可能永遠失去其獨立，真令人難受，但有時不妨自我安慰說：「總之，這不關我的事。」另一方面，「最使我無法忍受的是中國朋友們談論美國應負起保全中國獨立與完整的責任，因為美國是華盛頓會議的參加者。」³² 他向霍恩貝克報告，中國軍隊表現甚佳，「他們應當在與不知憐憫為何物的瘋人作戰時得到援助。」並且中日戰爭的正面影響將是喚醒美國國內那些「不計任何代價換取和平的孩子們。」³³

中國求生存路上的絆腳石——中立條例

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但是一直沒有宣戰。這是日本一貫的作風，不經宣戰的程序便發動戰爭，日俄戰爭是如此，偷襲珍珠港也是如此。中日衝突既已擴大，美國為了保護僑民和自己的商業利益，有人希望將中立條例（Neutrality Act）應用到遠東方面，此一爭論自七七事變後開始，持續了很久，不限於官員間相對立的孤立派和國際派，所有的報紙、社團、國會，都成了辯論場所。日本政府一直在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方式向美國購買戰略物資，用於殺戮中國人。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宣布封鎖中國海岸，但封鎖對象為中國船隻。至於中立國家的船隻則需停泊受檢查，其目的顯係阻止中國取得戰略物資。這時，美國政府不得不考慮是否實施「中立條例」，停止運輸戰略物資到中國，尤其要從速決定載有二十七架轟炸機的「韋其達號」艦是否應照原定計劃啟程來華。

赫爾以電報請求葛魯和詹森提供意見。葛魯贊成引用「中立條例」，在日軍封鎖海

³¹ FR, 1937, III, 460.

³² Johnson Papers,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信。引自 Borg, p. 315.

³³ Buhite, p. 132.

岸的情形下，對華貿易無法大量進行，不必爲了商業利益而冒險。³⁴ 詹森則強烈反對實施「中立條例」，此一行動將激怒中國政府中的領導份子，可能會對在華美人有危險的舉動。他提到最近一次與蔣夫人的會談，當他提到可能引用「中立條例」時，蔣夫人「十分怨恨」地說：「美國在中國正從事生死存亡奮鬥的道路上，竟過份地放下許多絆腳石。（The United States seemed to be going out its way to put obstacles in the path of China engaged in a life & death struggle）。」³⁵ 詹森指出，中國人認爲他們正在爲英國和美國而戰，中立條例將影響他們繼續抵抗的能力。³⁶

駐美大使王正廷於九月十日見到赫爾，強調中國如能獲得軍需援助即足以抵抗日本。赫爾說明中立條例之應用實爲國內輿論所迫，事非得已。王大使表示他瞭解美國的情況，但中國正爲生存而戰，正爲門戶開放的原則而戰，友好國家，尤其是美國，提供軍需乃屬必需。赫爾再次提出輿論的壓力，並說「我們也不知道下次宣佈政策是在什麼時候。」

四日以後，即九月十四日，美國總統宣布此後美國船隻禁運武器，軍火，或戰爭工具至中國和日本。霍恩貝克設法平息中國人的憤懣，次日，他接見王大使，向他解釋說：

我們當然不能假定或假裝我們不知道中國人會對此一步驟感到懊喪，但是希望他們考慮到導致我們這一結論的理由……大使一定已察覺近年本國對武器軍需貿易，對非戰，及對不使本國牽入戰事這方面輿論的發展，我指的是中立法長時期的草擬，討論，和立法，我指的是自七七事變以來，各方面氣勢汹汹地要求實行「中立條例」，我指的是政府兩個多月來一直設法節制不使其實行。我說昨天的行動主要是內政。

根據霍恩貝克記載，王大使對他的解釋深感不耐，回答說不論情況如何，中國人民會對美國政府的行動大大失望。兩天之後，王大使代表政府正式向國務卿表示對美國的失望。³⁷ 美國政府則未對中國人的憤懣作進一步的表示。

美國官員如霍恩貝克在解釋中立問題時，一再強調美國政府的苦衷在於輿論的壓力。當然國會、報界、和一部分和平運動中的孤立主義者形成了一股力量，但是國會中也有強大的與孤立主義對立的勢力，報界及和平運動的社團中亦然。³⁸ 尤有甚者，反對中立的聲浪正逐漸升高。總之，美國政府太注重孤立主義者的意見，以致未能對局勢全

³⁴ FR, 1937, III, 515.

³⁵ FR, 1937, III, 516.

³⁶ Buhite, p. 130.

³⁷ FR, 1937, III, 531.

³⁸ Borg, pp. 350-354.

盤瞭解，對孤立主義的壓力估計過高，而事實上孤立主義者的力量並不如想像的大。結果，最吃虧的是中國，抗日戰爭也因而打得更為艱苦。

國人的另一個希望——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訂於九月舉行大會，我國政府希望利用此一機會陳訴七七事變以來日本侵略的事實，要求制裁日本。希望列強不再袖手旁觀，並重新喚起世人對我國道義上的同情。於是在外交方面作了一番鋪路的努力，其中一項是王正廷大使與赫爾多次接觸，美國的態度是在國聯達成具體建議前不作任何與國聯合作的允諾。³⁹

中國代表顧維鈞於九月十三日正式向國聯控訴，提出日本封鎖中國海岸，轟炸非戰鬥人員，破壞教育文化機關等暴行，請求引用會章第十條，十一條和十七條採取行動，其中特別強調第十七條——如果日本拒絕與國聯合作，國聯得採取行動制裁。大會決定由九一八事變後組成的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處理。

美國並非國聯會員國，許多國聯會員國都很關切美國對這事件的態度。赫爾指令赫里遜（Leland Harrison）以不投票不發言的觀察員身份參加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的會議。同時訓令赫里遜，美國決定在國聯達成結論前，維持置身事外的政策。⁴⁰ 諸會員國認為美國的態度不切實際，他們念念不忘最近伊索比亞危機中，在應用國際壓力時，因不瞭解美國的政策，而遭遇了實際困難。這次，他們希望美國能積極參預，不只派一位觀察員來虛應故事。九月二十一日，澳洲代表布魯斯（S. M. Bruce）宣稱國聯應「超越會員界線」，安排一次會議，由與太平洋地區有關係的國家，例如九國公約的簽約國來參加。⁴¹ 英國代表克蘭波（Lord Craneborne）立刻表示贊成。

雖然英國也主張召開九國公約國的會議，但因不願開罪美國政府，轉而建議國聯在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之下另設小組，由太平洋地區直接有關的國家參加，以便更有效地討論此一問題。赫爾示意在國聯任觀察員的赫里遜反對另組小組的想法，認為中日爭端有其世界性，不應範圍於少數有關國家來討論。但是美國並未明確表示其意見，小組遂按照英國之建議組成。

十月五日，小組提出二個報告，譴責日本在華之行爲。第一個報告結論說日本違反條約義務，第二個報告駁斥日人所說中日爭端僅能由兩國自行解決，不能有第三國介入。小組同時提出召開與克蘭波建議類似的九國公約會議。值得注意的是顧維鈞曾在十月四日小組所舉行的會議上，要求國聯建議會員國採取某些措施，一方面切斷對日

³⁹ FR, 1937, IV, 18, 20.

⁴⁰ 同上，24.

⁴¹ 同上，26.

本的供應，另一方面協助中國。⁴² 克蘭波立即提出舉行九國公約會議以尋求解決中日衝突的辦法。事後克蘭波告訴赫里遜說，英國未能先與美國商量，因為當時急切地要以此來對付顧維鈞想迫使國聯採取行動的建議。⁴³ 英國人這時正企圖將中日衝突的問題由國聯轉移到有美國積極參加的會議上來討論。

克蘭波的建議在小組會議中引起爭端，顧維鈞認為會議的想法很好，但不能取代國聯的行動，目前形勢危急，不容拖延。如果國聯袖手旁觀，就是承認自己無能，「會使中國和幾百萬支持國聯的人失望。」結果僅有俄國代表李維諾夫 (Maxim Litvinoff) 支持顧維鈞。

顧維鈞在小組會議上曾建議修正「大會希望每一會員國盡其力之所及個別援助中國」的一句，加列以「物質供應及金融措施援助中國」，克蘭波認為這種措辭或許不能為九國公約國，尤其為美國所接受，於是未加採納。對於日本在華的侵略行為也拒絕用「侵略 (aggression)」的字樣。

小組的報告在當天便由諮詢委員會轉交國聯大會，預定次日投票通過。十月五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 (The Quarantine Speech)，言辭強硬，呼籲應將侵略者隔離。這篇演說使部分國聯代表深受感動。十月六日，小組所提報告，在大會上未再辯論便順利通過。

赫爾對國聯譴責日本的決議很感滿意，就在決議通過的當天，國務院發佈了新聞，說到「美國政府鑒於遠東的發展，不得不作結論說，日本在華之行動，與國和國間關係的原則不符，也有違九國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協定的條款。本國政府所得的結論與國聯大會之結論相符合。」⁴⁴

新聞發佈後次日，日本駐美大使趨訪赫爾，詢問美國對中日衝突的政策是否有所改變。赫爾說明：

列強自然對日本的行動感到憤懣，無法保持緘默，五十多國在國聯表示了意見，美國身為九國公約及凱洛格協定之簽字國，不能說這情形與我們無關，也不能不表示意見，認為這些協議的條款已被漠視。⁴⁵

葛魯對國務卿的聲明深感不悅，十月七日，在日記中說：

今日，在總統芝加哥演說之後，又聽到國務院支持國聯行動的消息，使我們全體人員大感震驚。我召集全體職員，告訴他們，不論我們個人對政府最近的舉動有何感受，……我們都必須小心不在使館外說出使人得到我們不同情政府行動的印

⁴² 同上，54.

⁴³ 同上，43.

⁴⁴ FR, Japan, 1931-1941, I, 397.

⁴⁵ 同上。

象的話來。⁴⁶

葛魯憂慮的是赫爾已採取新政策，也許不久之後，美國會與國聯聯合採取強硬的制裁行動。事實上，赫爾聲明的言辭雖然強硬，羅斯福「隔離」演說語氣雖然堅決，但充其量不過是虛聲恫嚇，試圖嚇阻並譴責侵略者而已。英國詢問美國是否有意實施對日經濟制裁時，美國在十月初回覆說美國政府無意制裁，並須牢記美國政府遵循反映人民公意的「中立條例」。⁴⁷「隔離」演說發表後二星期，戴維斯出發赴比京布魯塞爾參加九國公約會議前，晉見羅斯福，羅斯福反對使用「制裁 (Sanctions)」一辭，說這名詞不應再用，必須另找適當的字眼。⁴⁸

葛魯不相信美國參加布魯塞爾會議能有收穫。他在十月中旬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最先和最基本的觀念是避免捲入遠東的亂事，但我們却選擇了可能直接導致捲入的路……我又一次地害怕我們會狼狽地爬著出來，獨吞我們走這條路的惡果，而讓他國坐收漁人之利，這就是今天的國際主義。爲什麼，喔，爲什麼我們會不顧明明白白放在我們眼前的經驗和歷史事實？⁴⁹

布魯塞爾會議前英美的態度

國聯十月六日所通過的第二報告中言明將召集九國公約會員國及其他在遠東有利益的國家，舉行會議，以協議方式解決中日衝突。英國立即著手準備，與美國政府磋商會議細節。會議地點煞費周章，法國及荷蘭因顧及東南亞殖民地的安全，不願在海牙舉行。美國建議以比京布魯塞爾爲會議地點，比利時政府勉強同意，但說明會議邀請函上應註明，「在美英政府要求之下」邀請的，美國不同意，遂改爲「在英國政府請求和美國同意的情形之下」邀請。⁵⁰

最重要的問題是會議預備作什麼。不少人預料下一步便是由布魯塞爾會議來決定對日本的制裁。在英國，下議院於十月二十一日辯論外交問題時，艾德禮 (Clement Attlee) 建議如果中國接受停戰建議，而日本拒絕時，英國應提議對日本「國際禁運 (international embargo)」。他不相信日本會發動大規模戰爭，因爲日本太弱。「我從不相信日本會向全世界挑戰，全世界已在日內瓦對日本作了判決，但像那種缺乏行動的判決是毫無作用的。」⁵¹ 辛克萊 (Sir Archiwald Sinclair) 主張先行調停，調停不

⁴⁶ Grew, *Turbulent Era*, II, 1166.

⁴⁷ FR, 1937, III, 582.

⁴⁸ Davis Papers, 引自 Borg, P. 384.

⁴⁹ Grew, *Turbulent Era*, II, 1167.

⁵⁰ FR, 1937, IV, 69-72, 74, 79-82.

⁵¹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House of Commons) Vol. 327, Cols, 44, 75-77.

成時才實施制裁。他認為制裁異常危險，只能用作最後手段，羅斯福的「隔離演說」在他看來表示美國願意帶頭。⁵² 英國政府官員較為謹慎，艾登說討論布魯塞爾會議將採何種行動乃屬不智。他認為會議是結束戰事最好的機會。如果失敗，就必須「面臨新的情況」。⁵³ 艾登在赴布魯塞爾之前，曾說九國公約國會議最重要的一面是使得美國脫離孤立主義，重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如果為要取得美國的合作，他不僅願意由倫敦飛往日內瓦，甚至願意從墨爾本飛到阿拉斯加。⁵⁴ 英國政府發言人清楚地解釋，英國對中日衝突將採之政策需視美國而定。

十月十九日，英國照會美國國務院，建議兩國在開會前應針對日本不肯改變立場的情形，商議進一步的行動。華府明白表示拒絕考慮制裁的問題。

美國國務院中官員對制裁問題的見解不一致。國聯報告通過之時，赫爾召集同僚討論美國在九國公約國會議應採之政策，一般意見都認為此一會議除重申對日本行動的譴責以外，不可能有更大的成就。當時總統未回華府，國務院中人士也不瞭解羅斯福「隔離」演說是否表示美國將採對日強硬的政策。即將代表美國參加布魯塞爾會議的戴維斯希望美國是如此，他宣稱在遠東的利益雖尚不足以構成戰爭的理由，但美國值得為集體安全的原則而戰。⁵⁵ 這個意見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這次，霍恩貝克原則上反對像日本這樣「以武力來貫徹國家政策」，他相信為預防和平遭到破壞，必須用比道德壓力更有力的和平工具來支持，為停止戰爭，有時必須使用武力。他十月六日的備忘錄中便說各國應採對日「限制措施」，並考慮「建設性措施」。⁵⁶ 他在十月七日表示：「如果我們認真，如果我們講實際，就必須慎重考慮究竟我們是否願意採比表達意見更進一步的行動。」⁵⁷ 漢彌頓也建議「建設性和平措施」。赫爾、戴維斯及其他國務院官吏幾經磋商，無法決定布魯塞爾會議中美國採何政策。

一般說來，國務院官吏中對此一問題的意見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如果不及時阻止日本的侵略，那麼日本征服中國以後，繼續攻擊太平洋的英荷屬地，終於會攻擊菲律賓，而將美國捲入戰爭。另一派相信日本不會征服中國，反會在戰爭努力中消耗自己的元氣；即使日本能成功，於美國亦無損，因日本仍會與美國繼續貿易。總之，美國在遠東之利益不足構成戰爭的理由，日本不會在東半球攻擊成功，所以不會威脅到美國。⁵⁸ 最後，國務院所擬布魯塞爾會議中美國政策是這樣的：

⁵² 同上，Cols, 88-89.

⁵³ 同上，Cols, 65.

⁵⁴ Sir John T. Pratt, *War and Politics in China*, London, 1943, p. 244.

⁵⁵ *Moffat Diary*,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九日，引自 Borg, p. 400.

⁵⁶ *Davis Papers*,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備忘錄，引自 Borg, p. 402.

⁵⁷ 同上，十月七日備忘錄，引自 Borg, p. 402.

⁵⁸ Borg, p. 403.

問：美國是否願意從事制裁？

答：到現在為止，會議的範圍與目的只要求以協議來結束衝突。

問：美國能否同意任何會侵犯到(a)中國領土完整或(b)九國公約原則的解決方式？

答：不

同時，戴維斯也與羅斯福總統談到會議時的美國政策。根據戴維斯的記載，羅斯福覺得必須針對遠東的情勢有所作為，因為這牽涉到維持條約的「大原則（Great Principle）」，如果國際條約可以隨意破壞，就會造成國際間無政府狀態，危及美國的安全與穩定。必須有決心來嘗試使中日停戰，並設計出建設性的協議，一味等待情況的發展是極危險的，當時的情況便足以擾亂世界和平與進步。戴維斯問羅斯福，如果使中日停戰的努力失敗，美國代表就收拾行李回國呢，還是考慮「協調的努力使日本受經濟和其他的壓力」？總統「覺得我們不能就此罷手……我們必須考慮進一步的行動。」戴維斯懷疑美國的輿論是否會支持強制性政策，總統說如果日本失去理性，一心要征服中國，全世界和美國的輿論都會要求進一步的行動。⁵⁹

戴維斯在動身赴布魯塞爾以前再度在海德公園晉見羅斯福，羅斯福強調在九國公約國會議的每一步都應表示美國不願被推出成為未來行動中帶頭的國家，美國也不願看來像「英國風箏的尾巴」。將來布魯塞爾會議所決定的任何提議都應是與會各國一致的意見。卜格女士認為羅斯福的目的是藉此一會議動員全世界的輿論和道德力量來節制日本。⁶⁰海特（John Haight Jr.）認為羅斯福主張對日採強硬行動，直到布魯塞爾會議最後階段才改變主張，主要是因為赫爾的猶疑不決和衆議院的反對。⁶¹這方面筆者同意卜格女士的見解。

羅斯福的指示確實不够明確，在布魯塞爾會議中，戴維斯不斷與華府官員發生摩擦，問題就在美國是否應當在布魯塞爾討論制裁的問題。戴維斯的瞭解是他最後應當可以談，華府也有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的準備，但是華府的官員却想法不同。這將留待下面「布魯塞爾會議的失敗」一節討論。

法國禁由中南半島運輸戰略物資至中國

英國關心對日制裁的問題，法國却在這時提出萬一日本攻擊中南半島，美國及其他布魯塞爾會議的國家是否會對日採取行動的問題。

十月中旬，日本封鎖中國大部的海港，中國對外的惟一通道是由雲南至中南半島的

⁵⁹ *Davis Papers*, 十月廿六日，引自 Borg, p. 405.

⁶⁰ Borg, p. 407.

⁶¹ John Haight, Jr., "Roosevelt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Quarantine Speech," *The Review of Politics*, April, 1962.

鐵路。法國政府惟恐日本採取報復措施，於是禁由該一鐵路運輸戰略物資至中國。法國政府忙於歐洲事務，遠東無暇兼顧，只希望日本不攻擊中南半島。我國對法國的表現感到極度失望。在巴黎的顧維鈞大使就曾一再強調法國的決定對中國會有極嚴重的影響。十月二十一日，他向法國外交部長戴爾波（Yvon Delbos）表示，經由中南半島運輸軍火是有關中國生死存亡的問題，希望法國政府重新考慮。

法國政府重新考慮的結果是暫時仍維持禁由中南半島運輸軍火至中國的政策，因為日本曾隱約暗示將來攻擊中南半島並非不可能。但是法國聲明如果布魯塞爾會議中，九國公約簽約國同意在中南半島遭受日本攻擊時，給予法國有形的支持，那時自會改變此一決定。⁶²

羅斯福對法國這一措施非常關心。他向法國首相修當（Chautemps）間接表示意見，說法國的決定，對於美國熱衷希望在布魯塞爾會議達成的「以協議方式成功地解決」，會造成偏差。法外長戴爾波則說法國政府無意在布魯塞爾會議開始時，造成任何對「以協議方式解決」可能性的偏差，並重申法國的立場。⁶³

戴維斯在布魯塞爾開會前，曾與代表法國的外相戴爾波談話，他的印象是法國毫無與會議合作的意向，所感覺興趣的僅在建立美英法的政治陣線。戴爾波堅持說要想十八個與會國家聚會有所成就根本不可能，要拯救世界必先建立對抗獨裁的民主陣營，希冀日本和平解決殊無希望，重要的是應討論日本拒絕調停以後，與會國家所應採的措施。他不贊成對日制裁，但贊成對華援助，會議應考慮如何在中國海域中彼此保護法、英、美船隻及護航，從而解決由中南半島運輸軍火的問題。⁶⁴

各國所關心的另一中心問題便是日本是否會派代表參加布魯塞爾會議。葛魯很早就警告國務院，這個希望相當渺茫。十月十三日，他電告華府說，日本官吏表示政府對布魯塞爾會議毫無興趣。國務院立即通知葛魯去說服廣田，希望日本派遣代表團，因為美國相信此一會議將「提供一個有利機會來理智而坦白地討論目前和潛在的困難，目的在尋求經由和平協議而達成建設性的解決。」葛魯與廣田談話並無收穫，後來他得知日本絕不可能應邀派代表赴布魯塞爾，因為日本相信會議是國聯決議和美國譴責日本的宣言下的產品，基本上是與日本利益背道而馳的。⁶⁵

羅斯福得悉日本的態度後，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等到會議開始時再告訴日本政府，布魯塞爾會議僅是因國聯決議召開的，與美國國務卿十月六日的聲明無關。由此會議出面

⁶² Roger Levy and Andrew Roth, *French Interest and Policie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1, p. 56.

⁶³ *FR*, 1937, III, 637.

⁶⁴ *FR*, 1937, IV, 157, 162, 172.

⁶⁵ 同上，77, 100.

邀請日本派遣代表團，美國總統亦以私人資格向日本天皇表達此意。另一方面，國務院以電報指示葛魯「我方並無意在會議中宣布日本是侵略者。」⁶⁶但是，一切要求日本參與的努力都歸徒然。

雖然日本拒絕布魯塞爾會議的邀請，蘇聯輿論仍對會議持悲觀看法，真理報十月二十八日的意見認為，即使在日本缺席的情形下，布魯塞爾會議仍不可能達成任何積極決定，在這種情勢基礎下所作的活動只會造成空談的結果，而在此空談的掩護下，日本軍隊會繼續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罪惡的戰爭。

蘇俄尤其憎恨十一月六日會議開始後，義大利忽然出現，義大利在反共協定上簽了字，顯然站在日本一邊。李維諾夫在他赴布魯塞爾以前對戴維斯說：「蘇聯的直接利益，與英法比較起來，受遠東情勢的影響差得太遠。」由於英法態度軟弱，李維諾夫對會議結果缺乏信心。如果能取得英法美合作，蘇俄準備採強硬立場。⁶⁷

布魯塞爾會議的失敗

會議尚未舉行，但是綜上所述，這次會議已經有了不少暗礁——英美都不願帶頭，對制裁日本不熱心，美國政策曖昧而舉棋不定，日本拒絕參加會議。

布魯塞爾會議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正式舉行。先後參加的有十餘國。會議自始便要討論制裁日本的可能性，戴維斯認為這就是羅斯福向他指示的方向。在與艾登，戴爾波，李維諾夫及其他與會者談話時，戴維斯始終是說「美國大多數人的言論認為美國在遠東並無值得以武力護衛的」，但美國全國上下咸認中日糾紛牽涉到對付不法者以維護世界和平的更大問題之一環，美國相信該一會議應盡力尋求解決遠東衝突的方法，特別應設法動員全世界道德力量，說服日本與中國取得協議，如不成功，與會諸國再決定是否使用壓力以解決事端，美國將來的態度端視美國人民的態度而定。⁶⁸各國代表對戴維斯的議論反應冷淡。除英國外，都不相信能以非強制性措施有效地對付日本，也不相信能激起輿論，對日本發生道德影響。

戴維斯愈來愈失望，他準備在會議上發表的演講稿，被國務院改得面目全非，而他不得不用這篇修改後的講稿。⁶⁹演講大意是說明開會目的在恢復遠東和平，並為杜絕將來使用武力之企圖作建設性努力。英法俄代表相繼發言響應。戴爾波更進一步說，如果與會諸國不盡力設法遏阻「殘暴的屠殺（merciless massacres）」，那就無疑是共

⁶⁶ 同上，101.

⁶⁷ 戴維斯致國務院報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見於 Max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29-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1949 (2vols) 183.

⁶⁸ *FR*, 1937, IV, 145.

⁶⁹ 同上，134.

犯。李維諾夫更警告與會諸國慎勿墮入侵略者的和平陷阱，這種和平一方面對侵略者說「放心好了，搶來的都是你的。」一方面對侵略的受害者說「愛你的侵略者，不要與邪惡對抗。」

戴維斯於十一月十日向華府提出制裁計劃。為便於會議採納，計劃很溫和，其中最重要的兩點是：

不承認在中國所作不合或違反九國公約條例之各種改變；

為補充不承認政策之不足，同意拒絕提供日本任何形式之援助，尤其是借款，信用等等之與中日衝突有關者，或使日本獲利之發展有關者。⁷⁰

其餘三點是不採對中國軍事努力有歧視性之行動；不採說服中國訂立涉及中國不願讓步之協議的行動；在日本與中國達成協議前不給予日本軍事援助。此外，戴維斯請求總統向國會建議，停止將中立條例應用於中日衝突，並建造更多的軍艦。

日本一再拒絕開會的邀請，十一月十三日開會時，中國代表顧維鈞呼籲大會制裁日本，於是大會由英美法代表草擬了一則宣言，主張應考慮各國在日本拒絕談判的情形之下的「共同態度」。宣言於十一月十五日通過，義大利反對，北歐國家投票時棄權，因為實施有效制裁時，通常都是小國吃虧，得不償失。⁷¹

不幸的是，剛返回任所的國務卿赫爾完全拒絕戴維斯對未來行動的建議，使得戴維斯大感寒心。因為他相信羅斯福授權他在布魯塞爾討論制裁問題，却不料會有這種結果。但他仍不死心，欲說服國務卿改變其想法，他提到戴爾波與艾登也認為有限度的制裁乃屬必需。最低限度此次會議應通過一項決議，呼籲不承認以武力造成之改變，禁止政府貸款予日本，也不鼓勵私人借款。他更說，如果最後決議如赫爾所提議的，僅呼籲愛好和平的國家尊重和平的原則，那麼反會助長日本侵略的氣焰。如果西方列強只是說教，而無意進一步行動，那就如同在說服日本不妨繼續其侵略，因為不會有干涉的危險。⁷² 赫爾回電稱，採納不承認政策的決議時機尚未成熟。又說：

至於你建議的反對政府貸款並緊縮私人借款與信用的宣言，你應當記得這些措施是在邀請開會條件範圍之外的。你更應記得國聯在日內瓦參加會議的國家都絕對避免採取此類措施。⁷³

赫爾更排除廢止或修改中立條例的可能性。數小時以後，赫爾復以電報警告戴維斯：

自布魯塞爾來的新聞報導，尤其是過去幾天的，予人一種印象，其他與會國家願意並熱心來採取對日施加壓力的方法，只要美國也肯這麼作。這些報導的語氣似

⁷⁰ 同上，175.

⁷¹ Borg, p. 427.

⁷² FR, 1937, IV, 182, 183, 185.

⁷³ 同上，187.

在說美國應單獨對決定此次會議的態度負責。……我也請你注意布魯塞爾會議開會的目的，請你注意對日施加壓力方法的問題是在會議範圍之外的。⁷⁴

赫爾認為會議應以重申道德原則的宣言作結。英國代表不同意，覺得至少應不承認日本取得的領土利益，禁止政府貸款，緊縮私人借款與信用。最後美國國務卿赫爾的意見被採納，會議只宣布了一項重申原則的宣言，甚至比國聯所發佈的更溫和，內容則規避日本是否違反公約的問題。

葛魯在宣言公佈之後鬆了一口氣，但他在日記中說，不知道當初何以要開布魯塞爾會議。戴維斯非常傷心，對赫爾等人深表不滿，久久不能釋懷。

國人的又一次失望

中國代表顧維鈞的反應足可代表國人的感受。在宣言被大會接納後，顧維鈞發表簡短演說，坦白地說中國代表團對報告與宣言深感失望，事實上，這些僅是「原則之重申」，決不能對付遠東的嚴重情勢。他對會議不考慮積極援華，並對日採限制措施以遏阻日本侵略一事，深表遺憾。他甚至公開告訴記者，中國代表們覺得此次會議中英國人像是朋友，而美國人太令人失望。

布魯塞爾會議期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到二十四日），中國政府寄望於列強的支助，而且，希望英國和美國會允許並鼓勵蘇聯使用武力，對抗日本。⁷⁵ 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十一月六日的電文中報告：美國代表戴維斯告訴他，中國不應該接受德國的調解，因為整個事件並不單單牽涉中國和日本，而是關係著九國公約的簽字國。⁷⁶ 在十一月十日的另一電文中，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報告：英外長艾登有意在美國協同之下，採取對日的制裁行動。⁷⁷ 事實上，如上所述，戴維斯曾與艾登商討過許多行動的可能性，並且以電報向華府建議對日可行的強力手段。⁷⁸

布魯塞爾會議激起了中國方面得到西方援助的希望，南京政府遂拒絕與日方協談，日本政府急於在參加布魯塞爾列強未採取任何敵對行動之前，與中國政府達成諒解。十月底，日本請求德國調解，十一月五日，德國將日方之意轉告中國。主要有：（一）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如立即締約，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政府，惟希望委派一個親日的首長。（三）上海非軍事區擴大，

⁷⁴ 同上，197。

⁷⁵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中日外交史料叢編，第四冊，盧溝橋事變前後的中日外交關係，臺北，民國五十五年，頁四〇二。

⁷⁶ 同上，頁三九六～三九七。

⁷⁷ 同上，頁三九七～三九八。

⁷⁸ Borg, pp. 427-428.

由國際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七)尊重外人在華權利。⁷⁹直到布魯塞爾會議在未達成任何具體結果之下閉幕，中國政府才準備根據這些條件進行談判。然而為時已晚，受到會議失敗鼓勵的日本，態度轉為強硬，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一)中國放棄一切反日及反滿的活動，共同防共。(二)建立非軍事地帶。(三)協商中日經濟關係；(四)賠償此次敵對的後果，中國承認「滿洲國」。⁸⁰廣田弘毅十二月二十三日通知德國大使德克森(Dirksen)說：日本政府已經決定對中國提出上述條件，而且希望在一九三八年元月十號以前獲得答覆。雖然在德克森的判斷下，這些條件遠比十一月初傳遞給中國的更加苛刻，但他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轉交中國。元月十四日，德克森接到中國的答覆，表示條件太廣泛，太模糊。同日，日本召開軍事聯席會議，決定從此日本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而期待「新興支那政權」，日本將與之合作調整中日關係，並且「建立一個新中國」。如果說，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的失敗，使日本侵略者氣焰更盛，以致德國調停的努力徒勞而無功，一點也不誇大其辭。詳細的調停經過，留待下節討論。

德國調停的努力

德國與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有密切的關係，清末便曾派留學生赴德國學習陸軍。及至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時，國民政府便有意聘請德國軍事家來華設計大兵工廠，寫信委託德國工程師學會馬脫昂斯尋覓適當人選，馬脫昂斯推薦鮑樺爾，次年，鮑樺爾來華，提出整軍計劃，不久，蔣總司令聘之為軍事顧問。

鮑樺爾病逝於民國十八年，克里伯代理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民國十九年由佛樂爾將軍繼任。民國二十二年，德國前國防部長薩克脫擔任此職，貢獻他創立德國國防軍的經驗，與佛肯豪森及法普爾草擬「教導師建議書」，主張先成立一個教導師，以此為起點，逐漸強化全國的部隊，使其成為能戰的現代化軍事力量。民國二十三年，佛肯豪森繼任軍事顧問團團長，貫徹「建議書」中計劃，擴充並革新中國國防軍。

德國軍事顧問是以私人身份與中國政府簽訂合同在華服務的。他們貢獻技術，介紹新型武器，協助策略之擬訂，並訓練軍隊。中國政府在七七事變前整編軍隊，建設國防工事，調整軍需生產方面有可觀的成就，德國軍事顧問之功不可沒。對於德國方面也有好處：中國政府成為德國軍火工廠的大主顧，中國駐德大使館商務參事處便是經手購置德國軍械和武器的機構。⁸¹

⁷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東京，一九六二～一九六三，第四卷，頁一二五至一二六。

⁸⁰ 同上，頁一二八。

⁸¹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共兩冊，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六十二年，頁四三〇至四三二。

自九一八到七七，德國對日本侵華的行為深感不滿，除了考慮德國在華利益，德人也能看出中日作戰時漁翁得利的是蘇俄，因此毫不遲疑地拒絕東京請德國支持日本的要求。⁸² 英國曉得德日離心的情形，但未善加利用，即使利用亦不大可能有效驗，英國僅在七七事變以後，在美國反應冷淡之際，於七月二十四日與德國有所接觸，但無下文。⁸³

德國內部，黎本特洛普（Ribbentrop）在外交方面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不久就任外相，他是親日的，德國中立的政策，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即轉變為支持日本，後來德國在華軍事顧問亦被召回。英德之間一項合作舉動是運輸德意軍火，經香港轉交中國政府。在德國外交檔案中有一項記載，即三百萬美元的「貨品」，秘密由丹麥船隻運交新加坡的一個英國公司。⁸⁴ 軍械的最後目的地是中國，很是明顯。

布魯塞爾會議開會前夕，美國代理國務卿威爾斯（Sumner Wells）想說服德國參加，德國雖非九國公約簽字國，但在遠東有其利益，因此亦關心中日問題，美國知道德國國內有一派有力人士非常同情中國，雖然德日簽定了反共協定（Anti-Comintern Pact），他們仍舊親華，並反對中日衝突，⁸⁵ 美國務院認為希特勒政權也許會成為中日和平協議成功的重要因素。葛魯的報告說到日本絕不會向「集體調停」屈服，因為這種調停包含壓力的因素在內。他建議列強在布魯塞爾會議中最好的政策是指定一些國家密切注意事態發展，如果情況許可，由此一小型委員會或其中一國來提議調停。威爾斯立即將決議稿電告在布魯塞爾的戴維斯，關照他邀請德英兩國與美國在適當時機與中日合作，共同尋求達成中日糾紛和平解決的方法。⁸⁶ 後來德國並未參加這次會議，德國拒絕參加的理由是該一會議與國聯關係太過密切。但是德國對於幕後調停中日爭端甚感興趣。

德國如為中日和平效力，最能為中日雙方所接受。一方面，德國與日本有條約關係，另一方面，德籍軍事顧問正協助中國抵抗侵略，她不僅希望脫離這種兩難的情況，在高度政治的層面上，她也不能准許日本的對華戰爭。如果中日長期作戰，勢必迫使中國聯俄，而俄國是德國的假想敵。當華北戰爭逼近時，德國已與倫敦和華府商議調停事。早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軍開始攻擊北平之際，德國外交部在對駐日大

⁸² Ernst L. Presseisen, *Germany and Japan: A study in Totalitarian Diplomacy, 1933-1941*, The Hague, 1958, pp. 125-126;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I, Nos. 463, 472; Herbert Von Dirksen, *Moscow, Tokyo, London, Oklahoma*, 1952, p. 177.

⁸³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I, No. 468.

⁸⁴ 同上, No. 504. Presseisen, p. 158.

⁸⁵ *FR*, 1937, III, 625.

⁸⁶ 同上, III, 625, 648, IV, 97, 123, 124.

⁸⁷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I. No. 514.

使的訓諭中就作了如下的分析：

日本欲將對華的戰爭當作反共協定上所謂的反共戰爭的行動是不正確的，……該協約並不以打擊第三國境內的布爾希維克主義為對象。而且，日本的作為可被我方視為違反反共協定，因為日本阻礙了中國的統一團結，而增進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散布機會，終將使中國投入蘇俄的懷抱。

自始德國即持中立觀點，雖然在日本壓力下，她中止了對華武器的運輸，却仍不同意撤回軍事顧問人員，前項文件又續稱：

德國的對中國輸送武器，不能作為日德協議的對象。其時早有近乎戰爭的情況，由於我國中立的態度，更進一步的作戰物資將停止輸華。此時我們在華軍事顧問人員的撤退將意味著與南京政府的敵對，所以是不可能的，而且顧問們的撤離也可能造成蘇俄入據的空檔，這也是日本所不願有的結果。日本武官至今只向軍務部提出說，他希望顧問們不要參與主動的作戰行動，顧問們最近也已經得到明確重申的指示。

當上海附近戰爭激烈時，德駐日大使德克森走訪外相廣田，並商討可能的調停，但時機尚未成熟，日軍決意完成其對中國的壓倒性攻擊。

直到淞滬戰爭結束，中國仍未如日本所期地求和，日政府同意由德國充任調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方的第一次提議經由德國送交中國，但中國政府仍希望布魯塞爾會議能達成若干對日的制裁，遂未作答覆。十一月底，會議的空言顯然不能阻止迅速推進中的日軍，而且中國首都南京也將陷落，調停終於開始，中國政府通知陶德曼談和的意願，德克森再訪廣田，詢及以前日本之提議有無變動，廣田覆謂：除了日軍所得的偉大軍事勝利以外，十一月初的提議仍舊如故。德國當局依之通知中國政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陶德曼在漢口造訪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次日，他再往見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他所強調的日方和平提議是這樣的：

- 一、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
- 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如立即締約，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政府，惟希望委派一個親日的首長；
- 三、上海非軍事區擴大，由國際警察管制；
- 四、停止排日；
- 五、共同防共；
- 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
- 七、尊重外人在華權利。

三十日，陶德曼在南京晉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表示：假如日本無意恢復戰前狀

態，中國不能接受任何要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當陶德曼返回漢口，中國政府在蔣委員長召集軍事長官會報以後，決定：（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二）如此條件尚不算亡國條件，華北政權要保存。遂正式回覆稱準備以日本的提議作商談的基礎。然為時已晚，在華日軍總是要比日本政府進度迅速，華北的日軍已準備在南京陷落後，建立傀儡政權。

在日本佔盡優勢的情形之下，一個修正後的和平提議是消弭各衝突觀點的唯一途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十二月二十日，外相廣田通知德國大使德克森說，因為情況的激劇變化，中國軍事失利，布魯塞爾會議失敗，日本陸軍的要求更加苛刻，在原來的基礎上議和已不可能，日方請德克森轉交中國政府的新條件「支那事變對處要綱」如下：

- 一、中國放棄容共，抗日及反滿政策，與日、滿合作，實行反共政策；
- 二、設立非武裝區域，並在各該區域內分別設立特殊政權；
- 三、日、滿、中締結密切的經濟合作協定；
- 四、中國對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又強調中國若不依從這些條件，日本將不得不從一個新的立場作戰。該項條件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德大使轉交中國政府。

但是我方無法接受如此強硬的和平條件，尤以條件如此廣泛而模糊。一九三八年元月二日，孔祥熙對陶德曼大使抱怨：日本的條件簡直是一張未填數額的空白支票，他希望希特勒能對日施以溫和的影響力。在此緊張的時節，和談因為無明確答覆而停滯不進。

在德克森看來，繼續拖延會使日本微弱的和解態度轉為仇恨。同日，德國外交部接受他的建議，通知陶德曼說，中國政府必須以公平合理的形式及早答覆。為推進和談，廣田和德克森都同意，德國外交部也允許，德克森和陶德曼在不待柏林指示前，可有直接的接觸。

於是，日本外務部在東京和柏林同時施壓，希望此種壓力能對由陶德曼在漢口傳遞消息對象之中國政府產生影響。但日本提出的新條件斷絕了一切和談的可能性：

- 一、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的政府；
- 二、中國放棄其反日及反滿洲國的政策；
- 三、中國將華北和內蒙建立特殊政權，
 - （甲）華北建立合適的機構以實現中日滿的共存共榮，這些機構將有廣泛的權力，並努力於實現「三國」的經濟合作；
 - （乙）內蒙建立反共自治政府，其國際地位與外蒙同；

四、建立反共政策，由中日滿合作執行；

五、華中被佔領區建立為非軍事區，中日共同合作維持上海的和平，秩序及其經濟發展；

六、中日滿締結關稅、一般貿易、空防、運輸和有關國家資源發展往來上協定。

七、中國賠償一部分戰費、賠償日本損失的財產、支付戰時佔領的費用。

八、中國承認日軍在必要時入駐華北、內蒙、華中，以保衛安全；

九、在達成上諸項協議之前，不簽和約。

這些新條件對尚未回覆第二次提議四條件的中國政府是難以接受的。與其說此第三次提議是為了解決，不如說它意在斷絕德國調停成功的最後希望，連屢次勸戒中國停止戰爭的陶德曼都遲疑於對中國政府交出第三次提議。

當陶德曼仍在遲疑的時候，東京有另一重要發展。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德克森報告，他獲悉可靠報導，謂御前會議該日已決定，若包括九項條件的新提議不為中國接受，戰事將繼續進行，而且將不再以南京政府為對手，日本政府會與北平的聯省自治政府磋商。報導又說：新的補給船已駛往前線。但陶德曼大使已不必猶豫，因中國政府經過仔細商議，此時已作了決定，決心不落入日本要脅的惡毒陷阱。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三日，陶德曼向柏林和東京報告：

中國外長今天向我宣讀了口頭的文書，他請我轉告日本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若干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經由閣下善意地在南京轉告我們，接著，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二日閣下再度通知漢口和南京的中國當局以日本政府的意向，說日本當局表示，雖然日方得到軍事上絕對的勝利，十一月初日本政府提出的條件仍然有效。在德國善意的調停和日方恢復和平的希望下，我們準備接受日方所提的諸點為商議的基礎。

十二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七日閣下轉予我們一些日本的「基本條件」，說日本外相通知駐東京的德國大使，謂因情況的轉變，日本提出了新條件，經過適當的考慮，我們認為新條件的範圍太廣泛，因而中國政府希望獲悉新提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而達成明確的決定。

直到元月十四日下午，東京的駐日大使德克森才將此中國文書轉給日本。在遞交之前，上午十點，內閣開會商討關於「支那事件」的劃時代宣言，下午，在內閣議程上，軍方終於寫出了不以蔣委員長為對手的話。眼見德國調停的失敗，日本決定全面總動員與中國長期作戰。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五日，當陶德曼通知孔祥熙說，根據德克森所說，廣田視中國的答覆為一種逃避。孔祥熙答說，中國政府並無意採逃避的態度，他請陶德曼向日本政府

婉轉說明中國的態度。陶德曼覺得中國政府想以此一說明挽回上次聲明所造成的不利情況，他立即將之交給德克森，作為拯救調停的最後嘗試。元月十六日，廣田告訴德方，將正式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並期待新興支那政權的聲明。德國調停的插曲就此告終。⁸⁸

德國調停結束後，德國政府的中立態度也消失了。面對日本而非中國將是勝利者的冷酷事實，她盤算著自己的動向，終於決定接受日本在滿洲和華北所提供的經濟利益。由於日本的壓力，德國在華軍事顧問也撤回，而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日本所提的軍事同盟下，德國放棄一切對中國的希望，決定做日本的盟友。⁸⁹

蘇聯希望中日火拼

自始莫斯科就認為七七事變的爆發不是區域性衝突，並指責英國曾鼓勵日本，使其獲得侵略計劃不致有外來干預的印象。蘇俄報紙 *Izvestia* 在七月二十二日的一次分析中強調，蘆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長久以來預謀征服中國的第二步行動的開始」，像一九三一年一樣，英國似乎準備輕信日本所謂衝突區域化的保證，但目前的情況與一九三一年迥異，不提「蘇聯勢力大幅的成長所構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還有中國全國日益堅定的抵抗決心及日本內部力量的削弱。⁹⁰

蘇聯對中日衝突的態度原與英美有顯著的不同，但一九三八年中，也漸與英美的政策合調，在詳述其政策前，應該先考慮蘇聯對華政策在民國二十七年中及國共二次合作前的變化。

民國二十三年第五次剿匪的軍事行動開始之前，蔣委員長曾命陳立夫與中共協商以達成問題的解決，民國二十四年的秋冬，周恩來與陳立夫在香港有間接的接觸，中共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日，可見於二十四年九月一日周恩來致陳立夫函。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提出電文，請求停止內部敵對，展開和平談判。不久，周恩來和潘漢年分別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抵達上海，與國民政府代表張沖會談，共黨接受國民政府以下數點要求：

- 一、遵奉三民主義；
-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軍；

⁸⁸ 同上，No. 551, 552, 553, 554, 557, 558, 562。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五期，民國六十二年五月，頁一六三～一七五。

⁸⁹ James T. C. Liu (劉子健)，"German Mediation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38";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VIII, No.2, 1949, 151-171.

⁹⁰ H. Moore, *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1931-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240-243,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⁹¹

以國共合作為目的的西安事變發生以後，部分由於蘇俄的干涉，蔣委員長被釋，而談判仍在國民政府所提的四條件下進行。⁹² 蔣委員長相信中國共產黨已經懺悔，並誠心準備加入全國抵抗侵略的戰爭。許多年後，他承認自己「誤於過信」。⁹³

中俄關係在民國二十五年底和二十六年初有顯著的進步，中國駐俄大使蔣廷黻於二十六年三月在莫斯科告訴美國大使戴維斯（Joseph E. Davis）說中俄關係有不可衡量的進步。⁹⁴ 美國記者亞本（Hallet Abend）記載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的談話，他說鮑格莫洛夫告訴他，蘇聯在西安事變以前已經採取了一項新的對華政策，就是協助中國統一以減低亞洲戰事的可能性。⁹⁵ 四月，鮑格莫洛夫也告訴美國駐上海領事高斯（Clarence E. Gauss）說：莫斯科的觀點是蘇聯政府將支持南京政府，以之為國內穩定及政府最高權力，即使在蔣委員長西安被劫持以前即已如此。據鮑格莫洛夫稱，蘇俄已經獲致結論：「一個統一，有力，而對蘇聯友好的中國」將有助於保持遠東的勢力均衡與和平。⁹⁶

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後，蘇聯官方新聞充分反映其政府的親國民政府態度。⁹⁷ 八月二十一日，蘇俄與中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表示她對中國抵抗日本攻擊的贊許與支持。條約規定：

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方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雙方並承諾：「蘇聯不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和「中國不與第三國簽定共同防共協定。」貝洛夫（Max Beloff）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互不侵犯條約是俄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此後中國再也不能答應日本的要求，參加反共國家的陣營。日本也聲稱南京政府已成中國俄化的工具。⁹⁸ 實際上，蘇俄眼看日俄衝突危機日少，又想進一步延長中日戰

⁹¹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七三～七四。

⁹² 同上，頁八五～八八。

⁹³ 同上，頁十八及註十、十一。

⁹⁴ Max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Vol. II, 1936-1941, p. 174, 註一。

⁹⁵ 同上，p. 174, 註二。

⁹⁶ Arthur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9.

⁹⁷ Charles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New York, 1958, pp. 102-103.

⁹⁸ Beloff, II, p. 182. 邵毓麟曾談及共產國際促成中日戰爭之策略，見其「抗戰前後敵我若干重要策略之檢討」，*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四，中華民國史料中心，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頁三五二～三五三。

爭，遂有此舉。⁹⁹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向國務院報告，鮑格莫洛夫曾「向我抱怨在說服中國簽此不侵犯條約時所遭的困難，同時他未能順利將商務條約交涉成功。」¹⁰⁰ 同時，蘇聯同意對中國提供「除戰爭以外的協助」。俄國儘可能不積極參與對日作戰。俄國極想幫助中國，但惟恐在參與作戰時，德國會乘機攻擊，而俄國在遠東的軍隊由於政治上的鬭爭也不够穩固。如果日本經由中國威脅俄國的鐵路交通或貝加爾湖，那時俄國一定會參戰。¹⁰¹ 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際，俄國答應一項一億盧布（約合美金三千萬）的「機械借款」，正式的協議直到民國二十七年才簽訂。¹⁰² 先後計簽約借款三億美元。

中國向國聯申訴時，李維諾夫乘機說明俄國政府在中日衝突中的立場，在九月二十一日，他在大會上把在西班牙與在中國的衝突作一對照，並宣稱他確信國聯在目前能對兩國提供超乎他們要求的援助。在九月二十七日遠東諮詢委員會席上，李維諾夫促請注意說：英法代表對日本不人道的空戰的關注，不應被視為委員會容忍其他方式的對華攻擊的表示。十月六日國聯大會的決議，要求國聯會員國考慮儘其所能給予中國個別援助，亦為蘇聯所接受。¹⁰³

蘇俄的問題是，在不削弱自身安全，不引起侵略者對其直接攻擊的情況下，能提供多少援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柏林的俄國代辦對美國大使說，英、法、美希望俄國在沒有他們三國援助的情況下救中國，殊無可能，但却願意在一切可能採取的方式下，共同合作。然而，若干物資援助似乎在早期就供給中國。十一月間李維諾夫私下對美駐俄大使戴維斯預言中國不會放棄華北而與日本談和。即使華北淪陷，中國仍會進行游擊戰。他並暗示蘇聯將供給游擊戰所需的物資。¹⁰⁴

這些行動無疑使中國與蘇聯接近，而造成日本方面的不安，廣田於十月十五日告訴葛魯說：自從中俄協約簽訂以後，蔣委員長對日的態度轉為強硬，廣田自己已不再是一個自由的經紀人。他懷疑中俄互不侵犯條約有秘密條款。¹⁰⁵

有趣的是蔣委員長自己敘述蘇俄這時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時說：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捨爾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期。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張沖破例接見時，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

⁹⁹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一六。

¹⁰⁰ *FR*, 1938, p. 180.

¹⁰¹ Beloff, II, p. 181. 註五。

¹⁰²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 22.

¹⁰³ Beloff, II, p. 132.

¹⁰⁴ Joseph Davis, *Mission to Moscow*, New York, 1941, pp. 141-142.

¹⁰⁵ *FR*, Japan, 1931-1941, I, 402-403.

又說：聯俄本為威脅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覺悟則濟矣。¹⁰⁶但同月，鮑格莫洛夫突然在莫斯科失蹤。俄國大使館宣稱：謠傳鮑格莫洛夫已經被捕或被殺，因他可能曾使南京政府期望蘇俄的大量援助，而事實上不會有此種援助。¹⁰⁷十二月，史達林表示蘇聯如參戰，「會被視為有赤化中國之野心，反而於中國不利。」中國政府仍繼續與史達林磋商經由德國轉來的日本條件，惟蘇俄深恐中國對日妥協。中國政府於二十七年二月派一代表團在孫科的帶領下赴莫斯科，停留二個月，¹⁰⁸顯然蘇俄以物資和道義支持中國抗戰、使戰爭持續進行的政策並沒有改變。據蔣委員長說，史達林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曾予他一函，表示對中國最後勝利的「堅決信念」。¹⁰⁹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間，為數不小的補給品經由新疆運達中國，李維諾夫在一項聲明中答覆日本對此事件的抗議說：「包括飛機在內的對華武器出售，是完全合於國際法的……尤其對中國提供武器，正與許多國家提供武器給日本一樣。」俄國的「志願者」也在中國軍隊裡任飛機駕駛員、技術顧問、指導員，但是他們的地位不如那些德國前輩們高，影響力也比不上他們大。

蘇聯政府對國民政府之英勇作戰稱讚不已，甚至不惜改寫歷史，強調國共合作一向是和諧的，成功的。蘇聯報刊也一致讚揚蔣委員長為英勇傑出的領袖，他個人象徵了整個抗戰。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日本和平的試探為蔣委員長拒絕，蘇俄報刊大加讚揚。¹¹⁰

雖然蘇聯方面很少公開承認，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是一項事實。中國方面的資料顯示，一九三八年十月和一九三九年二月，有五千萬元的借款交給中國，附帶一些關於以機械和軍火交換茶、礦物及其他原料的安排。

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一項中俄商務條約在莫斯科簽訂，此條約擴展雙方的互惠，給予蘇聯商務代表外交地位與豁免權。同年八月，又有進一步的一項一億五千萬元借款。¹¹¹數目當然遠不及中國政府所期望的大。

更重要的是蘇聯對華政策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事實上，一位蘇聯的評論家在列舉導致日本突然發動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的攻擊的所有原因時，就包括有「南京與中國共黨紅軍之間積極合作的謠言」。國共合作繼續推動著爆發後的中日戰爭的進展。¹¹²

¹⁰⁶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八七，*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七四。

¹⁰⁷ Borg, p. 603. 註九十四；Young, p. 22.

¹⁰⁸ FR, 1938, 70, 114-165.

¹⁰⁹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八七至八八。

¹¹⁰ McLane, pp. 103-104.

¹¹¹ Beloff, II, p. 184-185.

¹¹² 同上，p. 186-187.

總之，俄國的態度仍以其本身利益出發。一九三九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立即削減對華援助。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竟背棄和中國的約定，與日本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日本進攻蘇俄的威脅已不存在，俄國遂停止對中國的援助。

結 論

列強的態度與中國的抗日戰爭自始便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且不論各國間彼此的矛盾和利害衝突，對於侵犯列強各國在華利益的侵略者，他們也未能採取任何有力的聯合行動。英、美、法、德、俄爲了種種原因，不願對不守承諾，違反國際條約，殘暴屠殺而野心勃勃的日本，實施任何形式的制裁，此一置國際正義公理於不顧的表現，造成了國際無政府狀態。列強怯弱的反應，更助長了侵略者的氣勢，增長了侵略者的野心。不僅是日本，連歐洲的德國也對領土擴張信心大增。李勃雷福 (Bradford Lee) 近年出版的英國與中日戰爭¹¹³就強調了這種互爲因果的關係。日本的逍遙法外，尤其是布魯塞爾會議的全盤失敗，不僅鼓勵了日本，更鼓勵了德國的希特勒，促使他毫無顧忌地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自此全球無寧日，終於導致法國淪陷，連英國自己也飽受被征服的威脅，惶惶不可終日。二次大戰以後，大英帝國國勢也走了下坡路。侵略的目標無止境，世界和平成了高不可攀的理想，徒成空洞的口號，侵略者殺人如麻，流血萬里。就是列強對侵略行爲的姑息，造成了這種惡性循環。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首慘絕人寰的悲壯史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幕大悲劇。

英美重歐輕亞，在遠東仍各有其不忍捨棄的利益，當然希望維持遠東的和平與安定。在中日衝突中，英國所採中立政策，與美國相形之下，似較積極，但亦止於有限的物質支援，不願破壞與日本之邦交，更不欲與日本作戰。英國認清日本之侵華是蓄意已久，有週詳計劃的，對英國利益的威脅很大。但英國政策建立在一項樂觀的估計上，相信日本在中國佔領區的經濟計劃勢必失敗，蔣委員長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可以支撐到日本經濟崩潰，到那時，英國政府積極介入，必可獲取更豐厚的利益，重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聲望。不幸的是英國的對日政策和對德政策一樣，都一敗塗地。除了姑息與侵略間彼此火上加油，更添上亞歐間互爲鼓勵的雙重惡性循環。日本人堅信，只要日本對英國遠東利益施加壓力，英國首相張伯林 (Neville Chamberlaine) 就會像姑息希特勒一般，向日本讓步。於是日本益發變本加厲地侵略，而希特勒眼看日本人在中國爲所欲爲，肆無忌憚，也就相信英美不會以軍事行動干涉他在歐洲的攻城略地。

七七事變以後，美國的表現較之英、俄、德諸國，更令國人失望。美國的國際地位

¹¹³ Bradford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日益提高，在遠東可說是舉足輕重的國家。小羅斯福總統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官員，絕大多數不贊同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期史汀生的遠東政策，認為當時美國的努力毫無效驗，有弊無利，反使美日關係惡化。於是在厘定新遠東政策時，格外謹慎，常有舉棋不定，猶疑不決的情形，加以國內孤立主義抬頭，重視國內輿論的美國政府儘量避免予人「帶頭」的印象，不願居於列強行動的領導地位。美國希望中國能積極從事建設，自立自強，成為具有實力的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這樣就足以對付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的利益與道德的一面，絕不容許美國眼睜睜看着日本置國際條約，人道主義於不顧，在中國不斷擴張，於是美國也採取道德說服（moral suasion）的辦法。七七事變之後，美國一再表示不偏袒任何一方，繼續穩定美日關係的努力，密切注意中日關係的發展。

戰爭爆發後，英國多次建議與美國合作調停中日爭端，均遭美國拒絕。美國一再逃避制裁日本侵略的問題，甚至連英法都支持的經濟制裁亦拒予考慮。美國較為積極的一項表現要推羅斯福的「隔離」演說，事實證明，充其量這不過是對侵略者的虛聲恫嚇，雷聲大，雨點小，從無以實際行動支援其聲明的計劃。另一方面，美國商人繼續出售戰略物資給日本軍人。在日本封鎖中國海岸之後，美國政府竟將「中立條例」應用於中國，在中國求生存奮鬥的路途上，放下了一塊大絆腳石。列強使國人寄以厚望的布魯塞爾會議，也因美國不肯支持最低限度的對日經濟制裁，而告流產，使日本對華態度益趨強硬，影響德國的調停工作，也使中國的抗日戰爭打得更為艱苦。直到民國三十年，珍珠港事變爆發，日本把侵略的箭頭指向美國，局勢才漸改觀。美國身受侵略之害，不得不加入遠東的戰爭。這時，屢受失望打擊，苦撐待變，英勇抗戰的中國，終於有了援手，望到了一絲勝利的曙光。

蘇俄的態度及其影響不容忽視。當初日本政府對侵略的動向，意見並不盡同，一派主張北進，攻擊蘇俄；另一派主張南進，進佔東南亞，尤其是中南半島。史達林洞察此一情勢，為了解除日本對其本身的威脅，設法破壞中日和解的可能性，更努力促成中國國內國共合作，組織聯合陣線，一致抗日，希望中日戰爭能持久進行。先有對華援助和參戰的允諾，繼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排除中國和日本簽訂反共協定的可能性，史家貝洛夫（Max Beloff）論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說是蘇俄外交上的大勝利。在八年抗戰中，蘇俄僅提供有限的物質、軍械、與人員之援助，從未參戰。民國三十年，甚至違反約定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徹底解除東邊日本給予的威脅。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夕，蘇俄在美國優厚的允諾下，才正式參戰，未費一兵一卒，坐收雅爾達密約所賦與的勝利果實。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勢力，由奄奄一息而日益壯大，蘇俄的扶助是極重要的因素。

德國和意大利作過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本文的研究對象僅限列強，意大利尚不夠強國的資格，故僅討論德國調停，不涉及意大利。惟意大利之工作亦有深遠之影響，在德國的努力沒有成就，告一結束之後，意大利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經由意駐華大使柯萊出面傳遞日方和平條件，此與汪精衛之主張和議，繼而成立偽政權都有密切關係，吳相湘教授在他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特別強調這點。¹¹⁴

德國調停之初，日本政府因見布魯塞爾會議開會在即，希望在列強決定制裁日本之前，與中國達成和議。中國政府雖願勉強接受日方議和條件，但對布魯塞爾會議抱着很大的希望，因此延宕不決。及至會議失敗，中國表示願意談和，而為時已晚，日方改提連德國都認為太苛刻的條件，調停遂告失敗，可見英美等列強態度影響之深遠。德國在調停失敗以後，認定日本必勝，轉而支持日本，民國二十七年二月間，希特勒發表演說，表示承認偽滿洲國，並恭維日本。我國輿論大譁，反德情緒高漲，民間且有抵制德貨的舉動。從此德國停止供應軍械武器給中國。是年七月，並召回以私人契約在華服務的德國軍事顧問，置苦撐待變的苦難中中國軍隊於不顧。列強對中國抗戰的態度，其影響之大，由此文可見端倪。

（本文之撰寫由國家科學會補助特此誌明）

¹¹⁴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四八，四八四至四八八。